

跑偏的帝国 大明王朝谁当家

皇帝不靠谱儿，大臣很变态，太监很强大
本书颠覆了你对权力游戏的一切想象

宗承灏 著





跑偏的帝国 大明王朝谁当家

宗承灏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跑偏的帝国 / 宗承灏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43-4711-1

I. ①跑… II. ①宗…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501号

作 者	宗承灏
责任编辑	吴庆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711-1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

十五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句实话，那次阅读体验并没有给我带来愉悦，只读得昏头涨脑，磕磕绊绊。也正是那次阅读，严重挫伤了自己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积极性。因为当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对于历史知识的认知度，还是源于教科书上那些没心没肺的文字干货。书没有读透，只好暂时放下，谁知道一放就放了十年。等到我再度拾起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曾经让自己迷恋的那些历史幻象或者真相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历史的真实度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唯有人心的真实才是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

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中所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一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追根溯源。黄仁宇先生让我懂得了，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也是可以这样读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并不是几个概念、几个观点堆砌起来的历史。近年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了明朝的官场。

明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其中的每一场局都是一个长期持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官场游戏贯穿始终，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就像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在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前，有一次他在听说自己的对手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言下之意，老子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这些官员，还是被当成冤大头忽悠。

这句话为三百年的帝国官场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皇帝与官员的权力博弈成为明王朝的主旋律。朱元璋扫平四方，他在自己的帝国布满了无所不在的特务网络，用铁血手段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尽管如此，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了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贪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官员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要净化帝国官场生态，而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拔刺”。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就决定了明朝的权力博弈不可能达到真正有效的“拨乱反正”结果。

草根阶层出身的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其中创业的艰辛是那些权贵出身的帝王所不能体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份家业的继承和延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这就像是一个穷困潦倒之人经过白手起家的打拼，成为亿万富翁。他不想自己的子嗣再吃自己曾经吃过的苦，再过自己曾经过的苦日子。作为创业者，他必须要为那些守业者扫清一切可能存在的障碍。无论是他杀戮开国功臣，还是废除丞相，让诸藩王离京，还是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等，皇权的专制，都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明朝才会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帝王政治和官场权力博弈的集大成者。可是整个大明政权机器，并没有按照开国者所预定的想法或轨迹往前发展，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的皇帝只有洪武、永乐两代，尽管这趟帝国列车一再跑偏，可它却能够保持不脱轨，延续 276 年国祚，这让人实在难以理解。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从一开始布下的局，已经为后来的文官斗权、阉党乱国埋下了伏笔，而每一场局都是帝国权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环环相扣，直到将帝国和它的末代皇帝崇祯扣成一道死亡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家天下”历史中，无论是皇帝治官的暴烈程度，还是官员之间权力斗争的猖狂程度，明朝都是一个可堪深度研究的标志性时代。而我这本书不过是抛砖引玉，博君一晒而已。

这本书完成之际，恰逢我的父亲宗为正先生七十岁生日，在这里就将这份薄礼赠与他，祝他永远健康。他老人家关注当代史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古代史，毕竟那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同时还要感谢那些爱我和我爱的人，感谢读过这本书的每一个人，你们是我走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宗承灏 于淮南家中

一、帝国的枯棋与势棋 / 1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让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从土地上走出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荒原上的狼图腾，一头大胆而狡黠的权力野兽。

他来自江湖的最底层 2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 10

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 30

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 40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 54

二、白骨堆不起一个清明世界 / 65

杀了那么多官员，几乎将整个帝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整破产了。朱元璋借着郭桓案，将自己的帝国来了一次上上下下的大清洗。在他看来，制度这种东西要保持它的新鲜度，越洗越健康。尽管每一次清洗，朱元璋都要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些案子也确实损害到了帝国的统治基础，也伤害到了全国士子阶层们的心。辛辛苦苦捞个一官半职，最后还是受到牵连身首异处。

空印案是一场小事故 66

贪和不贪都是大问题 75

来自民间的总动员 78

三、靖难之变：噩梦来临的前夜 / 93

朱元璋的决定对于“喜羊羊”朱允炆来说，无疑是一场人生的悲剧。朱允炆在登上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权力巅峰的同时，也被推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在强藩林立、虎啸狼嚎的帝国皇族里，他没有修炼成像朱元璋那样的狼族，而他的皇叔朱棣显然与朱元璋的性格更为接近。如果说朱元璋是一只权力野兽，那么朱棣也完全配得上一只“权力头狼”的称号。

皇位是块硬骨头 94

屁股下的火药桶 99

警觉的“喜羊羊” 103

跑偏的“三驾马车” 108

谁才是真正的王牌 115

疯子用暗器 125

致命的“多米诺骨牌” 131

四、文官集团：欲望是一把双刃剑 / 139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又是个不喜欢跳“双人舞”的演员，他要把所有的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要实现第一男主角的梦想，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

帝国的荷尔蒙时代 140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 154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 165

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 175

与狼共舞的日子 184



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 195

帝国需要这个古怪的道德模范 200

五、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角 / 209

魏忠贤背靠天启皇帝这棵大树，让那些有心杀贼的东林党人对他束手无策。别看平日里他们可以意气飞扬地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甚至在奏章里含枪带棒，连嘲带讽，可是等他们闹腾完了，皇帝怎么说，他们还是乖乖地怎么去干。谁让皇帝才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只是沟通皇权与朝臣的一道桥梁。就算他们倒霉遇上了一个昏庸之君，可是转念想想，这天下都是人家的私有财产，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皇帝爱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奴才们是无权干涉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国本之争”是一场政治赌博 210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 216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 226

六、是谁掐断了帝国的神经 / 259

将近三百年的漫长接力赛，从朱元璋开始，到朱由检接棒，如果说第一棒或者前几棒带有统治者的个人色彩，那么经过时间的冲刷，统治者的性格缺陷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帝国的病变血液已经渗进制度体系的肌理。遗憾的是，崇祯作为帝国赛道上的最后一个接棒人，他在病变四起的制度体系下将自己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当两者结合，帝国的死穴也因此被点中，并最终成为历史的一道无解之题。

魏忠贤：“第三代宦官之王”差一千到一万 260

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 268

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 282



一、帝国的枯棋与势棋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让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从土地上走出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荒原上的狼图腾，一头大胆而狡黠的权力野兽。

他来自江湖的最底层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捞着，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种子撒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时期，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省）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的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里或多或少暗含着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存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新生的孩子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迹象，反而在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艰难世道这场赌局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于封建时期的农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

元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了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也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的生活根本无法继续下去。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埋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丧失殆尽。朱家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間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此人曾经在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画符念咒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甥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被迫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世态度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庙里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到处去化缘乞讨。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民间社会时，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引发的。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那么从他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便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

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那一场接一场的灾难，就将他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容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做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缺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这些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

我们从朱元璋留下的那本《明太祖御制文集》中可以了解到，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居然会写一手还算过得去的文章。后来的戎马生涯，他应该没有太多的学习机会。他的学习机会更多应该来自于当和尚的那段相对来说还算稳定的时光，经文没有念进心里去，诗文却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御制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偪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泱。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才历练了他的多重性格。

等到朱元璋晚年时期，他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也不无得意地感慨道：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从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道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让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最近有人写了一部书，叫做《权力野兽朱元璋》，这个比喻很形象。从土地上走出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荒原上的狼图腾，一头大胆而狡黠的权力野兽。

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颖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幅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

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就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因为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在这个世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来管他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时，也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就在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生存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当然，促使着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形势逼人紧：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二是朱元璋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他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

也就是说，迫使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的并不是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为生活所迫。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

行为。那种文人士大夫似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在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后，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叫做《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绞杯”来为自己算卦（绞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他希望神灵能够为自己指引方向，可让人万分失望的是，朱元璋并没有从中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漂泊于世道上的游民。

作为那些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与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太一样（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算。

如何做才能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如何做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他们会将其中的利害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一套混世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一边英雄豪迈，一边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权力交椅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在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其实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一次计算过程，为自己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

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不会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他们便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了。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权力集团，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权力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就算反抗往往也是极其无力的。因此，在他们产生造反要求的同时，必然也要求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加上天生的一副好脑子，很快就独当一面。在其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渐渐地成为郭子兴身边的心腹之人。

郭子兴更是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称之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摇身一变就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后与他在庙里当和尚面对的情景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

郭子兴拉拢朱元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抱团的问题，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就连郭子兴的儿子也吓得躲藏起来。

朱元璋此时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元帅郭子兴遭到扣押的消息传来。他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其救出。

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得到了锻炼，耳濡目染，心智大开。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枪杆子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大的未来。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两个月后，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只好撤离，濠州解围。

元军虽然退去，可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消停，反而在失去外力的作用下愈演愈烈。这种没完没了的权力内耗，使得朱元璋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意。在朱元璋看来，这帮人压根儿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要想在这乱世之中捞上一票，就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哪里去找人？谁能够忠贞不贰地追随自己？朱元璋很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

这时候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已经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自己老家招兵买马，“倡农夫以入伍”。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朱元璋来说，意义重大。郭子兴也非常满意，将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可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是难成大事的主。朱元璋觉得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七百兵丁交给别人带。自己只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去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朱元璋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这二十四个人都是谁呢？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常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帝国的开国英雄。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

元末乱世一窝蜂出了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只有朱元璋摘取了权力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的草根，为什么能够笑到最后？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朱元璋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但是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中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扯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要命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能够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